

教育数字化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4.04.009



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困囿与纾解

赵利平^{1,2},朱露晓³,袁川²,郑勤红¹

(1.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昆明 650500; 2.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贵阳 550018;
3. 云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昆明 650500)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特定语境下,将数字治理纳入现代性问题域,为整体考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独特视角,高校如何在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以治理方式的创新迈向现代数字文明,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政策语境、学术语境和实践语境共同促成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当代出场,勾勒出从数治到善治的现代化图景。数智时代的变革性和复杂性加快了治理要素的现代性流变,高校数字治理在后发追赶与前瞻探索的过程中,存在追求现代性范式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矛盾。从政治形态、价值形态和文明形态3个维度审视,治理思维的线性化、治理主体的松散化和治理行为的碎片化,是多元治理要素未能精准嵌入复杂治理情境的重要诱因。中国式现代化以复合为取向的现代性范式,为纾解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困囿提供了中国方案,其理论转化逻辑是在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的基础上,突出高校数字治理的特殊性。实践路径应从复合属性切入,探索建立适配高校的复合型治理模式,实现数字治理价值、数字治理主体、数字治理过程和数字治理功能在高校场域的生态性整合,修正式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匹配的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现代性;高校数字治理;复合型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4)04009+12

修回日期:20240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发展阶段西南地区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22XTY017)

作者简介:赵利平,男,甘肃兰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领导与管理和教育数字治理研究;

朱露晓,女,湖南株洲人,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治理研究;

袁川,男,贵州黔西人,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通信作者:郑勤红,男,云南泸西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领导与管理与计算教育学研究。

引用格式:赵利平,朱露晓,袁川,等.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困囿与纾解[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9+102.

Citation format: ZHAO Liping, ZHU Luxiao, YUAN Chuan, et al. The modernity trap and relief of university digital governance [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4, 12(4): 9+102.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互叠加,数字领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人类正加速迈向数字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并且明确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新技术变革带来教育之间的不平等加剧^[1],实践应用先于理论的特征明显,表明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能否实现场域转换与坚持主体自觉,依托数字技术探索由传统到现代的治理创新转化^[2],对“现代化之问”作出实践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治理范式变革和治理效能提升。

因此,在教育数字化与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以数字技术驱动高校治理模式变革成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与此同时,在西方现代性全球扩散的现实环境中,数字技术和大学治理的结合,导致治理需求与治理手段之间的矛盾加剧,进而带来高校在治理场域遭遇现代性之困。高校如何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探赜现代性的高校数字治理困囿及纾解之道,从理论到实践都迫切需要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现代性治理体系,为高校数字治理提供必要的参考。目前,学界关于数字治理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是依靠数字技术的治理和针对数字技术的治理,本文的探讨范畴属于前者。

二、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出场学阐释

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秉承“方法论自觉”深入逻辑本源作出场学阐释,是追问和回答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因何出场、如何出场”的学术理路。任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范式”^①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宗旨是在差异化的时空语境中,适应时代变化选择恰当的出场方式。高校数字治理蕴含历时态与共时态双重向度,是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型治理形式。本文借鉴出场学研究范式,从出场起源、出场语境和出场形态3个维度,对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出场作整体性阐释。

(一)历史之维: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出场起源

1. 西方现代性

长期以来,学界对现代性这个抽象概念众说纷纭,至今尚未达成一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从现代性视角探讨高校数字治理。作为一个舶来品概念,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显然是在现代性基础上衍生的。据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考证,现代性概念可追溯至17世纪的欧洲,吉登斯、卢梭、法兰克福学派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进行分析、批判和解构,产生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回应方式^[3]。作为重要理论资源,现代性是关于现代化的理性抽象和观念表现,核心理念包括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4],其表征可概括为“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5],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囿于天然的矛盾与张力而不断引发现代性危机。进入数智时代,世界发展趋势尚未显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相反,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更迭进化的主要动力^[6]。

2. 中国现代性

^① 任平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一文中提出“出场学”研究视域,即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已有多位学者借鉴“出场学范式”在不同研究领域进行了探索,本文亦如此。

在基于辩证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做了初步探索^[7],认为现代性具备流动性,其消解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在于建构一种劳动逻辑。客观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皆属于后发外生型^①,在发展态势上经历了从被动应变到主动变革的创新过程;在发展方式上经历了从学习模仿到内在超越的艰难历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建构出中国的现代性,其逻辑起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超越、价值超越和实践超越。

3. 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

同其他领域一样,高校治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自然也受到现代性思想的影响。进入数智时代,数字治理成为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新路径,而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本质属性,没有现代性就没有现代化^[8]。可见,对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正确理解,是整体考量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西方现代性理论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历史之源,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思想之源,中国本土的现代性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现实之源,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直接为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出场提供了土壤。所以,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当代出场并非一种偶然,而是具备理论基础、物质条件和主体力量的必然结果。

(二) 当代之维: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出场语境

任何理论或概念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生成皆需要一定的语境作为“前理解结构”,这种前理解结构体现为基于已经存在的理解状态形成一种新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场的,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前理解结构,对高校治理现代化寻求一个新的理解语境。也正是在特定的政策语境、学术语境和实践语境综合作用下,我们勾勒出高校数字治理从数治走向善治的现代化图景,即现代性。

1. 政策语境

从国家宏观政策语境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全面推进,“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作为核心主题,“建设数字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聚焦政策语境,《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十大战略任务中就包括“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并将“教育数字化”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而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是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导向充分表明,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出场已经具备正当的政策语境,这一政策语境增强了高校治理的效能意识,为高校数字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 学术语境

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面临二重性问题,现代性自然成为国内外学界长期关注且反复讨论的话题。数智时代高校治理结构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出场,是在坚持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学术语境中,以中国现代性方案为根基,对西方经典现代性

^① “后发外生型”是指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现代化道路的两种类型之一,一般认为是对外部现代化压力和刺激被迫或强行做出的反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典型的后发外生型。

进行反思、借鉴,修正式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话语,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国内学界对数字治理的关注最早始于徐晓林等发表的《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体系构建》一文^[9]。自此,数字治理逐渐进入国内学者视野,关注点主要聚焦政府数字治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驱动,数字治理逐渐成为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近年来有研究探讨了高等教育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与实施路径^[10],从数字化赋能的角度探讨了高校治理效能提升的4个路径^[11],但鲜有学者将高校数字治理纳入现代性问题域进行考量。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探讨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具有独特的价值。

3. 实践语境

对于高校而言,治理不能脱离外在关联域而独立存在,实践语境决定着数字治理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发展。从提升治理效能视角看,高校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治理实践,是推进大学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手段,也是助力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治理实践,引发传统教育治理的结构性变革,通过对数据的精准挖掘和分析,实现由传统经验治理向数据驱动治理转型,进而有效提升管理效率和治理效能^[2],这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在实践语境中出场的根本因素。从提升人才培养效能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国家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过程中,高校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升人才培养效能,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高校数字治理的最终旨归是变革难以适应数字社会的人才培养模式,促成人才供给端精准对接社会需求端,实现大学公共价值的最优化。

(三)理论之维: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出场形态

现代性是现代组织具有的内在属性,对其认知的逻辑决定了现代化的理想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出场形态意指在特定语境中呈现的性状姿态与表现形式。合理呈现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出场形态,旨在依托数字技术全面提升治理的科学性,以数字善治化解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多种矛盾,形成现代化的理论风格和治理模式,这其中蕴含着政治形态、价值形态和文明形态。

1. 政治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政治形态这一概念用来描述在特定空间形成的一种政治状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描摹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政治图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探讨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而党的首要属性是政治属性,所以政治形态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在当代出场的首要形态,其作用是对治理过程中的政治状态进行描述和叙事,同时满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需要。实践表明,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有效回应人民诉求,实现人民利益,为高校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其政治形态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师生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民主协商和协同共治,核心是在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换中,探索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现代性”,把师生愿望、师生权益和师生福祉落实到数字治理的全过程。在此政治状态中,高校在数字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其领导干部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统筹领导能力对政治形态具有关键作用。政治组织的变迁和职能演变是其功能产生的依托,所以高校以何种组织样态变迁来支撑政治现代性,也是政治形态的重要变量。

2. 价值形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数字技术在高校治理场域是产生正向效应还是负向效应,与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支点,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精神特质。一方面,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师生的全面发展,摒弃西方现代性以资本为中心的物化逻辑,确保走向数字善治的高校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价值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底座式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合作和共赢的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高等教育变革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数智时代的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指向一种充满复杂性和多元式的融合教育形态^[12],所以立足中国式人本逻辑,顺应人才成长规律和需求趋势,既关注育人效能又体现人文关怀,尊重每位学生的禀赋差异和起点差异,打造以人本理念、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数字人才,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3. 文明形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主要体现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哲学基础^[13],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传承和创新,由此实现以人本逻辑驾驭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超越。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科技革命加快推动人类文明进程,数字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呼之欲出。集绿色与智慧于一身是数字生态文明的重要特点,做人类文明传承创新的先行者、引领社会数字文明形态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学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之“文明形态”应体现数字文明发展趋势,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通过数字赋能建设数字友好型高校,以新型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空间等的探索构建生态化的数字治理新范式,最终形成人与数字化和谐共生的治理生态。

三、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现实困囿

在后发追赶与前瞻探索的过程中,高校面临追求现代性范式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矛盾张力,当现代性逐渐演变为工具理性而过分膨胀时,就会使高校数字治理陷入现代性困囿之中。据此,可以从政治形态、价值形态和文明形态3个维度审视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困囿。

(一) 政治形态维度的现代性困囿

从领导效能视角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和实践指向的辩证统一,核心是在多元主体的联动中凝聚现代性合力,构建现代性共治模式。作为数字治理的核心主体,高校党委、行政的领导效能是现代性政治形态的前置条件。从文献研读和现实对照中发现:第一,目前学界和业界更加关注治理主体的融合,在结构逻辑上表现为“一核引领”与“多元协同”有机结合的统一体^[14]。然而,高校领导在高校数字治理场域凝聚现代性共识和整合现代性力量的领导力有待提升。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涉及若干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但部分高校领导仍依赖传统的线性治理思维,仅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热衷于风险系数较低的局部性改变,倾向于以“事本主义”逻辑回避治理结构的深层次改革,依靠技术革新回应体制性难题^[15]。

从组织变迁视角看,行政改革和组织变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基础保障。随着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高校组织样态逐渐分解成基于“政治性”的线下治理空间和基于“专业性”的线上治理

空间。随着数字治理的持续推进,二元治理空间共存导致的组织模式冲突逐渐显现^[16]。从功能性角度分析发现,“部门壁垒”“数据壁垒”等障碍导致高校协同治理能力弱化。由于组织逻辑、思维逻辑和行动逻辑的不同,政策和信息的相对割裂,导致高校数字治理缺乏统一的整体标准和推进机制,高校内部教务系统、科研系统、人事系统等采取第三方“外包运作”,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性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整体性治理任务被不断分化、分解和打包,分块治理多停留在资源碎片式堆积的初级化阶段,出现了相对封闭的“重复建设”“资源孤岛”等问题。

(二) 价值形态维度的现代性困囿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既取决于其现代性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又依赖于价值取向在制度规制下的可行性^[17]。“韦伯命题”指证了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难题,包括公共价值迷失使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18]。强调人的主体性是现代与传统的分水岭,从高校数字治理到高校数字治理现代化,语境变迁和表述进阶意味着对理性化的合理祛魅,其实质是整个教育治理系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19]。

西方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治理理论在内在逻辑上具备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自洽性,在评估与排名的直接驱动下,锦标赛制理论广泛进入高校,人文主义缺位下的工具理性对人的思维产生异化,导致“唯数字论”在高校治理场域逐渐生成和扩张。高校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和公共价值在数字化浪潮中逐渐弱化,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也渐趋失语。现代性背后的根本支撑是理性,数字技术为量化考核的可操作性提供了便利,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言:“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20]在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的影响下,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造成价值理性的荫蔽,且这种僭越在大学内部治理领域表现更为明显^[21],并逐渐在数字治理场域形成工具理性范式,引发诸多实践问题。一是借助数字平台将文山会海向线上转移,演化出加码式减负,各种异化的APP及新媒体工作群带来的信息交叉重叠使数字治理陷入流量陷阱,甚至打卡、浏览、下载、转发等成为强制任务,教师生活碎片化、忙碌的节奏失序使他们产生时间焦虑症^[22];二是忽视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教师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产生数字弱势、数字分化等数字挤出现象;三是依托工具理性建构非人本化的规章制度,自上而下进行政策传递和压力传导,“留痕主义”在日常工作中广泛盛行,滋生更加隐蔽的数字形式主义。

(三) 文明形态维度的现代性困囿

中国式现代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文明互鉴,具有显著的中华文明特质。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文明形态最终体现在治理范式的变革上,推动现代性具象的现代文明在高校场域更迭演变。历史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数字技术作为“现代新兴器物”,成为一把既走向现代数字文明又增加文明冲突的双刃剑。传统社会的现代性多呈现固态的稳定性,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以“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对现代性转型的一种隐喻。数智时代的变革力量和复杂情境驱动相对固态的现代性呈现液态的加速流动性,这种加速流动天然具有矛盾属性和互斥张力,所以,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传统文明和数字文明在高校治理场域的冲突和博弈带来了“文明融合阵痛期”,也从侧面印证了在文明转型过程中“液态”与“固态”两种现代性的基本问题。

在流动现代性的影响下,数智时代的治理环境趋于复杂,主客体相互关系相较于传统治理发生了

某些变化,衍生出数字治理主体窄化、数字权力无序扩张、数字形式主义滋生、数据孤岛现象突出等现代性文明难题。在数字技术与治理变革的交互作用下,高校权力生成和作用机制发生改变,在向虚实同构的双重空间扩张时,高校数字治理由于现代性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滞后,存在“手段—目的”的价值悖论,技术不是既定法理程序理性的严格遵从者^[23]。所以在传统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换中,道德约束机制缺失和数据伦理风险容易致使数字治理陷入失序状态,数字权力在“寻求控制中失去控制”。进一步而言,在组织与技术关系维度,由于要素错配和融合障碍,在数字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并不能很好地嵌入高校科层组织,导致相互冲突、相互羁绊等“数字负能”^[24]难题产生,制约着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一方面,数字技术与高校治理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模糊了休闲与工作的时空边界,遮蔽了劳动过程的新型剥削,客观上为数字权力的失序扩张及数字官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数字权力扩张与约束的失衡加重了技术权力化,数字权力在治理场域运行缺乏生态铁笼,不断侵犯师生的“数字人权”;另一方面,科层权力依托数字技术强化了对基层的控制力,行政主导和垂直领导导致自上而下式的精密协调与分工形成条块分割的组织业态,进而导致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协调乏力和反应滞后的状况出现^[25],高校内部教务、人事、学工、财务等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不高,在数据采集、共享和使用上难以达成一致,物理性的数据孤岛增加了数字治理成本,行政性的互通障碍降低了数字治理效能。

四、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困囿纾解

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如果不能与数智时代深度融合,就难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目标。一般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是价值缺失与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对现实之困做出探赜性回答,是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责任。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基于此思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困囿的纾解必须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和高校治理场域,探索一种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特质、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逻辑、蕴含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的现代性治理模式。

(一)走向复合现代性: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理论思考

霍金(Hawking)在20世纪末就预言“下个世纪将会是一个复杂性的世纪”^[26]。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一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等多种现代性理论解释框架,为阐释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提供了理论视角,但这些理论视角都不能有效透视其复杂形态和未来走向。通过现代性反思可以发现,过于依赖理性至上非但不能实现理想的治理形态,反而会陷入治理困境。在中西政治思想文化交锋激烈的当下,如何进行现代性理论的耦合调适,纾解高校在数字治理中产生的现代性困囿,亟待关注。

在现代性理论解释框架中,复合现代性是在批判、借鉴一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等基础上,聚焦特定场域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范式,既承认现代性要素的多元复杂性,又致力于通过向内挖掘的自觉转化超越向外模仿。复合现代性强调,现代性是不同时空和主体的现代性要素在不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与交融互构^[27]。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彰显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复合,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属于复合现代性范式^[28],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祛魅,又完成了对自身现代性的转换。

高校在传统治理实践中,由于过多依赖线性思维而形成稳定的治理惯性。然而,当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治理场域后,高校样态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流变,这种复杂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通过

前文分析可知,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痛点是由于治理隔阂带来的治理要素碎片化,其本质是治理主体未能准确识别传统高校向数字高校转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依然以简单线性思维进行数字治理实践,导致治理行为缺乏整体性和有效性,从而引发治理空转^①现象和治理悬浮难题,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了基于工具理性主义的线性治理无法有效适配高校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复合逻辑决定了高校数字治理的复合性,数智时代的多元联动要求高校数字治理元素具备复合性,二者的叠加促使高校数字治理成为难以简单透视的多层面立体复合体。

高校数字治理的复合特征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高校数字治理是在时空压缩的场景中出场的,面临治理现代化、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才培养等任务的复合重叠,导致其发展具历时性和共时性;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我国高校数字治理面临后发赶超与前瞻探索的双重压力;三是高校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数字善治”需要传统治理要素与现代治理要素发生复合效应。从向内挖掘的自觉转化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复合取向”的现代性范式,为高校走出数字治理现代性困囿提供了中国方案,其理论转化逻辑是在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的基础上突出高校数字治理的特殊性,进而探索构建适配高校治理现代化实践诉求的新型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数字治理价值复合、数字治理主体复合、数字治理过程复合和数字治理功能复合4个方面。一是数字治理价值复合。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兼容并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以面对数字转型时期多元化和异质性的治理诉求,高校数字治理的复合现代性价值取向需要秉持尊重包容和求同互鉴的态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赋予数字治理价值正当性,引领治理要素形成相互依存的复合联动关系。二是数字治理主体复合。数智时代的治理是一个纵横复杂的开放性结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渐成趋势,复合现代性范式下高校数字治理在治理主体上表现为“中心+多元”的复合型结构,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的治理需求和治理情境,对中心治理主体和多元治理主体进行调适,以突破传统高校单一主体的治理格局。三是数字治理过程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体现共性发展取向的现代化,蕴含合作共赢的智慧,复合现代性在尊重差异性的同时,指向超越狭隘的个体利益观,建构一种合作共赢的新秩序。数字技术驱动高校样态变迁引发治理领域的拓展和治理边界的模糊,所以在治理过程中推动治理元素转向复合式“分工—合作”具备合理性。四是数字治理功能复合。赶超型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采取多种功能复合的发展方式,而高校数字治理的功能复合就是破除现行二元空间的束缚,从以往串联式治理功能向并联叠加式治理功能拓展,在复杂治理情境中实现治理功能的整合。

(二)转向复合型治理: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的困囿纾解

基于线性思维的简单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数智时代日趋复杂的数字治理情境。作为全新的现代化模式,共建、共享、共治的复合型治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途径,为高校数字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选择。结合前文对高校数字治理的复合现代性分析,从“复合”属性转向“复合型治理”,是高校数字治理现代性困囿纾解的实践路径。复合型治理并非一个臆想的概念创设,而是针对高校数字治理“要素隔阂”“治理碎片”等现代性困囿,基于复合现代性理论探索的新型治理模式,其本质是合作、沟通、协商,优势在于不同的现代性治理要素在数字治理场域交互复合和灵活互构,即实

^① 空转原是描述机械运行的状态,本文特指治理资源消耗与治理目标达成的不匹配现象。

现治理价值复合、治理主体复合、治理过程复合和治理功能复合。

1. 数字治理价值复合:培育兼容并包的治理理念

在治理场域,矛盾的生发点在于价值观的多元性与治理价值的公共性之间存在冲突,因此,对于公共治理而言,价值的合理性首先表现为公共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突显公共性在现代性谱系中的核心作用,批判借鉴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多元宽容,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包容型智慧,倡导一种“生态平衡”的价值观念,在“和而不同”中推动多元价值互鉴对话和融合共生。在高校数字治理场域,存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治理取向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复合型治理兼容并包的治理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应激匹配性,寻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效融合的“最大公约数”,生成数字治理的内生动力,彰显数字治理的价值正当性。

在高校数字治理场域,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力量和行动指引,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动力和技术支撑,二者互为依托。所以高校需要在观念层面培育一种新型复合治理思维来引领数字治理实践,有效调适二者之间的张力和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和数字叠加。

中国式现代化以“新型理性”为基础提供现代化治理方案,完成了国家治理中工具理性主义的新解答^[29]。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期的多元文化诉求,高校数字治理的新治理理念应然指向“人文之治+数字赋能”,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一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兼容并包与柔性复合的理性,强调尊重人性,关注人的潜能,重新审视人与数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防范技术崇拜脱离人的本质属性,以此超越西方现代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分裂的悖论,推动人与机器由对抗冲突走向人机共生的良性发展^[30]。

2. 数字治理主体复合:释放多元集聚的治理势能

现代治理的基本取向是多元协作,当代西方民主也倾向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和复合^[31]。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与构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高校数字治理主体既包括传统的政治主体和行政主体,又包括民主主体和社会主体,不同主体在治理场域具有不同的属性差异,很难寻求整齐划一的治理方案。在复合型治理中,数字治理主体复合的聚焦点不再是多元治理主体的物理叠加,而是依托数字技术,针对不同治理场景和具体问题形态,科学研判并选择与之相适配的“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复合结构。“政治势能”作为中国共产党核心理念的政治表达,是对党的全面领导下能量机制发挥的学理性回应^[32]。在“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复合结构中,政治势能展现“高位推动”和“能量转化”,汇聚复合型治理势能。

治理势能取得良好复合效果的核心逻辑是,作为治理中心的高校组织进行“先应式复合”,发挥元治理主导作用,但主导不等于支配,关键是校级领导干部要具备复合领导力,协调数字治理各现代性要素间的复合关系,增强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能动性,在复杂领导情境中提升复合领导效能。具体而言,复合领导力涵盖3个维度:第一,树立以系统性、融合性和协同性为特征,适应集体取向和价值引领的新型领导理念;第二,建立以协作性、包容性和持续性为特征,以“因材施教”为核心的复合领导模式,适应复杂治理情境下差异化的领导需求;第三,突破以空间性、组织性和边界性为局限的领导行为,突破科层组织边界藩篱,实现与外部治理主体的跨界复合,弥补组织资源差距,促进资源整合共享。

3. 数字治理过程复合:适配联动长效的治理机制

机制联动长效是复合型治理的重要特征。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衔接需要构建和完善融合机制、联动机制、并联机制和合作机制^[33]。数字技术的显著特点是万物互联,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新型协同机制更有利于实现治理要素之间联动长效,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无论是传统治理还是数字治理,权力的配置与规制都是核心议题,面对利益的多元化和治理的复杂化,治理联动和数据联动如何在治理过程中实现长效,也成为高校数字治理的重要议题。因此,数字治理过程复合的重点是适配联动长效的治理机制,包括权力联动长效机制、执行联动长效机制和数据联动长效机制。

一是权力联动长效机制。传统行政伦理向数字行政伦理的更迭对数字法治提出要求。实现有效数字治理,要建立与治理机构行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相匹配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机制^[34],重点是以“赋权增能”和“权力监督”塑造高校数字治理的复合性权力结构,适配自上而下的授权赋能联动机制和自下而上的权力监督联动机制。二是执行联动长效机制。根据具体的治理目标和复杂的治理环境,以全链式联动和一体化执行适配执行联动长效机制,推动治理主体从“单打独斗”向“集成作战”转变,形成横向联动和纵向贯通的执行联动闭环,破解治理实践执行难和碎片化问题。三是数据联动长效机制。探索建立以集中统一数据运营模式为核心的数据联动长效机制,将数字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源整合起来,在保证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有序开放和自由流动。

4. 数字治理功能复合:打造立体交互的治理空间

治理空间的现代化转型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治理效能作为理解数字治理的新维度,无论是基于“政治性”的线下治理空间还是基于“专业性”的线上治理空间,其根本目的都是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基于治理有效性考量,针对治理空间分解带来的结构性缺失和功能性障碍,从二元空间的简约治理走向新型空间的复合治理,是数字治理功能复合的应然选择。作为高校数字治理的关键层级,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立体交互的治理空间,以此实现数字治理功能复合,为多元治理要素互动提供公共能量场,是现代性组织走向扁平化和敏捷化的密码。数字治理空间的特点是功能延展性和结构灵活性,可有效纾解教务、学工、招生、人事、就业等业务在空间、资源和交互方面的诸多限制,突破部门壁垒、信息孤岛等数据桎梏。

数字治理空间主要包括物理治理空间、数据治理空间、数智治理空间和情感治理空间等。物理治理空间通过采集现实数字治理环节中的相关数据传送至数据治理空间,再从数据治理空间获得指令调整治理行为;数据治理空间是新治理空间的指令中心,负责治理过程中数据的汇聚和分析;数智治理空间是对物理治理空间进行1:1三维建模复制的综合映射,实现高校数字治理整个过程的全息式智能监控和动态交互;情感治理空间是各治理元素形成符号认知、行为互动和价值迁移的心灵载体。

五、结 语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首要属性和本质表达,为阐释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追溯发现,现代性背后的根本支撑是“工具理性主义”,在治理场域造成数字赋能和数字负能共存的客观事实,困扰着当前高校数字治理新实践。在教育数字化与治理现代化双重叠加中,基于“复合现代性”理论解释框架,探索高校数字治理的现代性话语,旨在为高校数字治理提供必要的价值引导和实践修正。但是,从现代性视角审视高校数字治理,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本研究抛砖引玉,仅为学界提供一种思路借鉴。因此,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对其进行论证,并融入典型案例、面板

数据等进行混合分析。同时,期待更多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关注“治理现代化”新课题,共同探讨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校数字治理话语体系,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贡献学术力量。

参考文献:

- [1] 蔡宗模. 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及我国的应对[J]. 现代教育管理,2022(5):1016.
- [2] 张海生.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与治理效能转化[J]. 重庆高教研究,2024,12(2):2526.
- [3] 李佑新. 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3542.
- [4] 于伟. 教育观的现代性危机与新路径初探[J]. 教育研究,2005(3):5157.
- [5] 鲁品越,骆祖望. 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J]. 中国社会科学,2005(3):5969,206.
- [6] 衣俊卿.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 中国社会科学,2004(4):1324,205.
- [7] 刘军. 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当代意蕴[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9(5):2937.
- [8] 虞崇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现代性、中国性、世界性[J]. 探索,2023(4):1528,2.
- [9] 徐晓林,周立新. 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体系构建[J]. 管理世界,2004(11):140141.
- [10] 冯新新. 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与实施路径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47.
- [11] 沈乃丰,刘芑健,胡纵宇. 数字化赋能:高校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23(7):6977.
- [12] 赵利平,吴晓英,郑勤红. 走向“新现代性”:数字革命下中国式劳动教育新道路[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10):815.
- [13] 王雨辰,王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态意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5):1-9,203.
- [14] 谢琦. 社会治理智能化背景下党的数字领导力的整体性逻辑及其阐释[J]. 行政论坛,2023,30(4):4350.
- [15] 黄晓春,嵇欣. 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J]. 社会科学,2016(11):7279.
- [16] 姜宝,曹太鑫,康伟. 数字政府驱动的基层政府组织结构变革研究:基于佛山市南海区政府的案例[J]. 公共管理学报,2022,19(2):7281,169.
- [17] 朱文婷. 世界现代性困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结构性应对方案论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22(6):1017.
- [18] 王结发. 从“韦伯命题”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J]. 社会主义研究,2023(4):2633.
- [19] 靳澜涛. 从教育治理到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理性[J]. 中国电化教育,2021(10):5456.
- [20]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29.
- [21] 张宏.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教育技术发展的现实思考[J]. 教育研究,2016,37(11):2832,53.
- [22] 阎光才. 大学教师的时间焦虑与学术治理[J]. 教育研究,2021,42(8):92103.
- [23] 张雪帆,蒋忠楠. 公共行政的数字阴影: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伦理冲突[J]. 公共行政评论,2022,15(5):164181,200.
- [24] 盛明科,贺清波. 数字赋能政府治理何以产生“数字负能”:基于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的交互视角[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6(4):123129.
- [25] 侯浩翔,钟婉娟. 人工智能视阈下教育治理的技术功用与困境突破[J]. 电化教育研究,2019,40(4):3743,58.
- [26] URRY J.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global[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005,22(5):235254.
- [27] 张振波,金太军. 复合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图景[J]. 文史哲,2020(3):1219,165.
- [28] 袁红英. 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框架体系与实践方略[J]. 改革,2021(5):1828.
- [29] 刘新刚. 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及其解答[J]. 中国社会科学,2023(6):4261,205.
- [30] 陈涛,韩茜. 教育场域中技术焦虑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向:基于马克思“人与机器”思想的时代阐释[J].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1):4660.
- [31] 牟硕,林锦涛. 当代西方民主治理的复合结构[J]. 世界社会科学,2023(3):96111,244.
- [32] 贺东航,高佳红. 政治势能:党的全面领导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分析框架[J]. 治理研究,2021,37(5):79-85.

[33] 任保平.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衔接的机制与路径[J]. 人文杂志, 2023(1): 27.

[34] 李建伟, 王伟进. 社会治理的演变规律与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J]. 管理世界, 2022, 38(9): 15, 62.

(责任编辑: 杨慷慨 校对: 张海生)

The Modernity Trap and Relief of University Digital Governance

ZHAO Liping^{1, 2}, ZHU Luxiao³, YUAN Chuan², ZHENG Qinrong¹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2. Guizhou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8, China;

3.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corporating digital governance into the domain of modernity issues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How universities can move towards modern digital civilization through innovation in governance method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ic ac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hat needs urgent research. The policy context, academic context and practical context have joint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temporary appearance of the modernity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universities and outlined a modernization picture from digital-governance to well-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ve nature and complexity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are accelerating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elements. In the time and space compression of latecomers catching up and forward-looking explor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in universities fac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rsuing modernity paradigms and overcoming modernity crises. Looking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form, value form and civilization form, the linearization of governance thinking, the loosening of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governance behaviors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multiple governance elements to be accurately embedded in complex governance situations. The modernity paradig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ch is oriented towards compounding, provides a Chinese solution to the modernity dilemma of university digital governance. It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logic is to highlight the particularity of university digit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consensus path is to start from the compound attribute, exploring the appropriate “compound governance” model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compound of digital governance value, digital governance subject, digital governance process and digital governance function in the university field, and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university digital governance that matches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a modified way.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odernity; digital governance in universities; composite governance